

二十世紀蒙古獨立建國的三件大事

藍美華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摘要

蒙古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件重要的大事，分別是 1911 年的泛蒙古獨立運動、1921 年的獨立建國運動以及 1990 年代的民主化運動。這三件大事分別是在清帝國衰敗、俄國帝制與蘇維埃政權交替以及蘇聯瓦解等大環境變動下發起的，蒙古能夠積極把握時機是明顯易見的。從蒙古的個案看來，一個民族想要獨立建國最重要的是大環境允許，而且自己擁有獨立建國的決心、能力與共識。獨立建國的能力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文化思想的準備，另一方面是務實的政治軍事。最後，民主化對於蒙古非常重要，讓它成為真正獨立的蒙古。

關鍵詞：蒙古、獨立建國、泛蒙古主義、民主化

蒙古是在 1921 年獨立的，明年即將慶祝獨立一百年。蒙古獨立並非一蹴即成，從 1911 年推動，至少經過十年努力才有初步結果。最初的獨立也並非真正的獨立，而是受中俄互動影響，剛開始中華民國政府根本不承認，其間也有半世紀之久地位如同俄國衛星國；直到 1990 年民主化啓動，1991 年蘇聯解體，蒙古在嚴格意義上才真正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經過幾個階段，蒙古才能真正獨立。本文試圖從 1911 年具有泛蒙古主義色彩的獨立運動，再到 1921 年較務實而僅限於外蒙古的獨立運動，最後討論蘇聯瓦解前後蒙古的民主化運動。這三件大事標記了蒙古獨立的過程。本論文除了敘述這三件大事外，也企圖詮釋三者間的互動關係，並探討蒙古獨立建國的模式與意義。

壹、1911 年蒙古獨立運動

二十世紀蒙古開始獨立運動，最早最重要的就是 1911 年的獨立運動。這個獨立運動希望建立一個大蒙古國。雖然發起的是外蒙古的王公喇嘛，但是他們希望建立的大蒙古國是包括所有蒙古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內蒙古、呼倫貝爾、唐努烏梁海、布里雅特等；所以筆者將其定義爲一個泛蒙古主義的獨立運動，是和清朝末年政府統治能力降低，日本、俄國對中國的政治與領土野心增強有關。

在滿人統治的帝國裡面，蒙古各個地區是分成幾個階段（內蒙在 1636 年、外蒙在 1691 年、準格爾則在 1757-58 年）成爲大清國的屬地，其中內蒙各部最早做爲滿人盟友，一起打下江山，因此和滿人關係最密切，聯姻也多。清廷對蒙古的政策是依據不同時間的需要，而做適當的改變，但其目標維持不變，即是爲大清的利益服務，亦即利用蒙古人做爲機動性軍事力量以保衛大清國，尤其是帝國的北疆。此外，也要避免分裂的蒙古在某個深具魅力的強大王公或宗教領袖領導下再度統一。對清廷而言，其對蒙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長城以北的領土，和中國歷朝的動盪情況相較，算是相當平靜。清廷和蒙古的關係總體來說是友好的，蒙古王公對於滿人君主也具有忠誠度。

然而，當大清國開始走向衰落，日俄對蒙古野心增強，清廷對蒙古的政策開始改變，想要更有力地控制蒙古。清廷原有的政策在 1902 年做了重大調整，由禁制轉為鼓勵漢人移民開墾蒙地，新政先在內蒙，再擴大往外蒙施行。這個劇烈的轉變對於蒙古當地的人是具有威脅性的，尤其是對原先有高度自治的外蒙更是如此。因此，在庫倫（現今之烏蘭巴托）的蒙古王公開會討論如何處理，並決定派人向俄國求助。一開始，俄國其實並不支持蒙古的獨立想法，但最後仍派人接見了代表團。蒙古王公回到庫倫之後，就開始了獨立運動，在 1911 年 12 月 29 日宣布獨立，把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拱上帝位，當了博克多汗，成了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

獨立之後，蒙古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設立了由內務、外務、兵務、財務、司法等五部組成的內閣（Dindub, 1977: 26-27）。庫倫政府先把在庫倫的滿清官員逐出，然後派軍隊控制了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兩個重要的城市。因為這次獨立運動是希望建立大蒙古國，所以庫倫也派人去其他蒙古地區宣傳這個運動，在呼倫貝爾、內蒙古、唐努烏梁海這些地區，王公都派人到庫倫來表示他們願意加入這個蒙古國。內蒙 49 旗中有 35 旗曾表達對蒙古新政府的效忠（Ширэндэв & Нацагдорж, 1968: 450），還有些直接帶著牲畜和人民前往庫倫。

當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登基為大汗後，蒙古國立刻致函北京政府，通知其蒙古人已經重新恢復獨立，並強調蒙中雙方應各自防衛邊境、維持友好關係，在中國南方的混亂局面恢復正常秩序後彼此協商簽訂條約（БНМАУ-ын ШУА-ийн Түүхийн Хүлээлээ & НАХЯ-ны Дэргэдэх Улсын Архивын Хэрэг Эрхлэх Газар, 1982: 169-70; Dindub, 1977: 28-30）。但是中國並沒有放棄，一直和蒙古保持聯繫，希望蒙古放棄獨立。蒙古皇帝博克多汗在和中國的大總統袁世凱許多書信來往中表示，蒙古有獨立的權利，也決定要獨立，希望和中國能保持友好的關係¹。庫倫政府不僅反對撤銷獨

¹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北京努力勸說蒙人取消獨立。他在給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電報中表示，外蒙獨立是錯誤的，因為它不但人口稀少、財力不足，而且軍力虛弱、政治落後。又說，蒙漢合則兩利，離則兩傷；一旦外蒙同意放棄獨立，蒙方一切要求均可商酌；並要庫倫別受俄國煽動所誤導。哲佛在回覆的電文中強調，蒙古宣佈獨立是爲了保存自

立，也堅持由俄國擔任調人。

不僅中國不承認，實際上俄國方面也不承認蒙古的獨立，畢竟俄國自認和中國的關係更為重要；支持蒙古獨立會影響它和中國的關係，是不妥的。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中國和俄國開始討論如何處理蒙古相關事宜，在1913年11月5日簽訂聲明文件，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而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此外，中國同意不在外蒙駐軍、設官及殖民，但是可以任命大員駐庫倫以監督中國利益不受侵犯，還接受俄國作為中國與外蒙重建關係的調人。在中俄互換的照會中，雙方同意召開包括外蒙在內的三方會議以討論外蒙的政治及土地交涉事宜。此照會也界定外蒙的自治區域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²。

接著於1914年9月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圖開會，在1915年6月7日簽署了「中俄蒙協約」。其要點包括外蒙承認1913年11月5日簽訂的中俄聲明文件與互換照會；外蒙承認中國宗主權，中俄承認外蒙自治，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中俄承認外蒙自治政府在內政上完全的權力；中國駐庫倫辦事大員及在外蒙各地的佐理專員得總監視外蒙自治官府及其屬吏之行為，使其不違犯中國宗主權及中國暨其人民在自治外蒙的各種利益；自治蒙古的區域以前清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³。當天中國也正式照會俄蒙，宣稱中國將對附從外蒙自治官府之蒙人，加恩完全赦罪，並准內外蒙人民照舊自由來往居住（陳籙，1971：52-58；畢桂芳，1968：23b-25b）。如此一來，蒙古就從短短三、四年的獨立變成了自治。

己的種族、宗教與領土完整，並非受到他人誤導；請求中國當個好鄰居、不要威脅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重申蒙古獨立的必要性；又說即便有喪失主權的危險，蒙古別無選擇，只能冒險由俄國擔任相關事務的調人。參見唐在禮、唐在章（1912：14b-18a、19）、БНМАУ-ын ШУА-ийн Түүхийн Хүлээлээ 與 НАХЯ-ны Дэргэдэх Улсын Архивын Хэрэг Эрхлэх Газар（1982：117-18）、及陳崇祖（1926a：14-17）。

² 中俄聲明文件及照會，參見「中俄聲明文件（附另件四款）」，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03-32，168，173（1），民國2年11月5日；陳崇祖（1926b：16-18）。

³ 協約中文本，參見陳籙（1971：42-52）；協約蒙文版，參見「收外交部公函函送蒙文協約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045-308，民國4年10月6日。

蒙古在很多地方都顯示了泛蒙古及大蒙古國的意涵，也在 1913 年 2 月派軍隊到內蒙去，希望能夠解放內蒙；不過，戰情先盛後衰，隨著 1913 年 11 月 5 日中俄聲明文件的簽訂，最後這件事情並未成功。在解放內蒙的戰爭中就有很多內蒙人參與、領導這個戰爭；在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圖的討論之中，蒙方代表中也有內蒙古、呼倫貝爾的代表。中俄蒙協約簽訂之後，1911 年的獨立運動正式宣告失敗，中華民國政府也派了新的官員到庫倫、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幾個地方去。

因為 1911 年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主要是喀爾喀的王公喇嘛，所以在後來蒙古的歷史中，並不重視這一次的獨立運動，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運動，而非平民發起或是社會主義的運動。

雖然這個運動失敗了，但是它有它的意義，因為它給蒙古人帶來經驗，讓他們知道怎麼樣去發起一個運動，這個運動的失敗也讓他們可以檢討為什麼這個運動會失敗。這個獨立運動中國當然是不同意，而且俄國也不支持，蒙古王公請求其他歐美國家支持他們，寫信去給幾個國家，可是完全沒有人理會，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此外，中國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對於內外蒙古的優惠政策，希望能夠說服蒙古人放棄這個獨立運動。但是從中國和蒙古雙方的互動來看，蒙古人的獨立意願是非常強烈的；倒是有些內蒙的蒙古人在中國的強力拉攏或是壓制之下，尤其是蒙古解放內蒙的戰爭失敗之後，動搖了原有想法。事實上，有些內蒙王公是對雙方都押寶的，也就是說，他們對庫倫政府表示支持，有些也對中國表示支持。

1911 年蒙古獨立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是，這是一個泛蒙古主義的運動。蒙古人雖然分成了東、西、北幾個部分，但是他們都認為自己是蒙古人，這樣集體的民族認同是存在的。最早應該是從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之後，開始建立蒙古共同體的認同。中間雖然蒙古又分裂了，但是在清帝國的時候，他們有機會共同處於滿人的統治之下，而且彼此的往來是很多的，這有助於蒙古身分認同的再次建立。

貳、1921年蒙古建國運動

1911年蒙古獨立運動失敗了，但是蒙古人並沒有放棄獨立的意願；他們利用很多的機會學習，也和俄國方面的白軍或紅軍聯絡。原來他們是支持白軍，也受到白軍的影響，譬如布里雅特哥薩克兵團首領謝米諾夫（Grigorii M. Semenov）手下的恩琴（Baron 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等人；恩琴甚至於1921年2月佔領了外蒙首都庫倫，並於3月份成立以活佛為領袖之獨立政府⁴。在這段期間，蒙古（其後所稱蒙古即為原來之外蒙古）有些人和紅軍聯絡，隨著俄國內戰當中紅軍一步步走向勝利，蒙古也自然傾向了紅軍。恩琴佔領外蒙也讓蘇維埃政府有合理的藉口在1921年7月9日正式佔領庫倫。

隨著紅軍的勝利，蒙古和紅軍搭上線。紅軍也想利用蒙古作為世界革命在亞洲的一個模式，對於蒙古的獨立運動加以支持，在1921年7月派了軍隊和蒙古軍隊一起進了庫倫，建立了新的政府。這個新政府仍是君主立憲，是有皇帝的，擔任皇帝的還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還是博克多汗，可是他的權力要比1911年第一次獨立時的權力要來得低，只是名義上的皇帝而已。在1924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過世之後，蒙古就改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不再是君主立憲、政教合一的國家；名稱也從蒙古人民國改成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庫倫也改名烏蘭巴托，意思為紅色英雄，可以看出社會主義蘇維埃的色彩。

蒙古1921年的獨立運動成功，除了俄國的幫助之外，還有很多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協助。布里雅特蒙古人原來參與了在日本支持下由謝米諾夫推動的泛蒙古運動，雖然於1919年初建立「大烏里政府」，但這個政府僅存在七個月（1919年2月至9月），很快就失敗了（Кыpac, 2017: 59-60）。面對走向勝利的布爾什維克，布里雅特人不得不改變策略，轉而與其合作，許多知識分子以俄國公民和蒙古同胞的身分投入在外蒙的事業。他們希望透過幫忙外蒙獨立建國，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對他們作為俄國公民的角色

⁴ 關於恩琴在外蒙古的活動，參見楊詩馨（2006）。

有更大的幫助。

在 1921 年到 1928 年期間，布里雅特蒙古人在蒙古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僅在文化方面，他們在政治方面也負責很重要的工作；扎姆察然諾（Ts. J. Jamtsarano）和倫琴諾（E. Rinchino）就是其中兩個很重要的人物。可惜這些布里雅特蒙古人在 1930 年代開始的大整肅當中，絕大多數遭到整肅，離開蒙古，回到俄國，下場淒然。布里雅特人在蒙古的權力地位較高，也讓許多喀爾喀蒙古人心裡覺得不安，畢竟他們才應該是蒙古的主角。可是蒙古這一次的獨立能夠成功，本來就是依賴蘇聯與共產國際的資源與協助，這中間就有許多布里雅特人的參與。

1921 年建立的蒙古獨立國，並沒有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但是這個時期的蘇聯政府是比 1911 年獨立運動時的俄國政府更支持蒙古獨立，他們也明確表達這樣的立場。中華民國政府是直到 1945 年戰爭結束、蒙古辦理獨立公投獲得成功後，才在 1946 年年初正式承認蒙古獨立。在 1921 年到 1946 年之間，蒙古和中國的來往是不多的；除了商人之外，蒙古幾乎都是跟俄國來往。俄國的各項作法，譬如農業集體化、大整肅、白色恐怖等，蒙古都是亦步亦趨的。也可以說，實際上是俄國在領導或是控制蒙古，而蒙古並不能不理俄國。所以，蒙古和中國的關係疏遠，但是跟蘇聯的關係卻越來越密切。

對於蒙古的獨立，其實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一開始是不願意承認的，但是因為英、美都希望俄國參加對日戰爭，他被迫同意透過戰後公民表決的方式來決定是否蒙古可以獨立。公投的結果完全顯示蒙古人的共識，贊成獨立，所以蔣中正也不得不同意。1945 年 8 月 24 日，他在國防委員會與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中以〈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為題的致詞中說道：「外蒙自北京政府時代民國十一年起，事實上已完成其獨立的體制，如今已屆二十五年。當此世運一新之會，正重敦舊好之時。我們必須秉承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本黨一貫的方針，用斷然的決心，經合法的程序，承認外蒙之獨立，建立友好的關係，使得這個問題能夠圓滿的解決。否則將使中國與外蒙古之間永無親善之可能，其對於國內安定與世界和平，更將因此而發生重大的影響。」（蔣中正，1945）

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告，承認外蒙古獨立。公告內容寫道⁵：「外蒙古人民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內政部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近據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務人員之報告，公民投票結果已證實外蒙古人民贊成獨立。茲照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審議決定，承認外蒙古之獨立。除由行政院轉飭內政部將此項決議正式通知外蒙古外，特此公告。」藉此公告，蒙古正式獲得中國政府對其獨立的承認。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也承認蒙古獨立，並與之正式建交，互派大使。

南京的國民政府1949年遷到台灣之後，1952年2月1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中華民國所提「蘇聯違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致威脅中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及遠東和平案」（簡稱控蘇案）。1953年2月25日，蔣中正總統根據立法院的決議，明令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也不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⁶。然而，不管中華民國政府承不承認，蒙古確實就是獨立了，最重要的是在1961年10月蒙古人民共和國獲得接納，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⁷，雖然在聯合國中蒙古只能追隨蘇聯的意見，但進入聯合國一事對於蒙古獨立國家的地位仍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與影響。

蒙古1921年的獨立建國得以成功，當然與國際局勢以及蘇俄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協助有密切關係，但蒙古人堅持獨立的決心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他們在戰後公投中表現了主張獨立的集體共識。此外，蒙古記取了1911

⁵ 《國民政府公報》1946年1月7日；亦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等（2003：98）。

⁶ 中華民國在聯大控蘇經過及控蘇案全文，參見蔣廷黻（1952：262-309）。廢止對蒙古獨立的承認，參見蒙藏委員會（1952：26）。

⁷ 蒙古一直想加入聯合國，但由於它濃厚的附庸色彩，無法令國際間承認其為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所以一直無法加入。後來蘇聯改採整批交易的方式，試圖挾帶蒙古進入聯合國。1960年，蘇聯把蒙古的入會問題和非洲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的入會問題扯在一起，威脅我國，若我國否決蒙古入會，則蘇聯將否決茅利塔尼亞入會。當時非洲國家都熱切希望茅利塔尼亞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因此他們也要脅我國，若我國導致茅利塔尼亞無法入會，則當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問題時，他們將支持由中共政權取代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棄權，蒙古於1961年10月28日加入聯合國。參見藍美華（2000：53-54）。

年獨立運動失敗的經驗，不再堅持建立一個包括各蒙古地區的「大蒙古國」，僅在北蒙古／外蒙古建立自己的國家，這種妥協在當時也是必要的。

參、1990 年蒙古民主化運動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一開始就承認了蒙古的獨立，這對蒙古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很好，蒙古獲得雙方同時承認獨立是可以從兩邊獲利，從北京和莫斯科都取得優惠的待遇，以及人力和物資大規模的協助。1952-60 年期間，外蒙與中共的關係進展迅速，在質與量方面都有具體的成果，中共也打破了蘇聯獨佔的局面，在蒙古擁有一席之地。可惜，中蘇友好的關係並未持續太久，在 1960-66 年期間，雙方關係日益惡化，蒙古與中共關係受到影響，難免產生動搖。蒙古本想保持中立，但在蘇聯壓力下，不得不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下，表明立場，靠攏蘇聯，蒙古與中共的關係也因此由動搖而趨於惡化⁸。

之後，蒙古跟中共的關係就幾乎完全受蘇聯與中共關係的影響，跟著蘇聯批判或抨擊中共。中國大陸在 1979 年開啓改革開放之後，逐步有了和蘇聯關係正常化的跡象，後來隨著蘇軍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紮大幅減少和從阿富汗撤軍，中蘇關係得以改善。1989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北京和上海，雙方關係才正式正常化。隨著中蘇關係正常化，蒙古和中共的關係也有了重新開展的空間。當時中蘇蒙三國都走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中共先開始改革開放，蘇聯從戈巴契夫執政後期也開始改革開放，蒙古也跟上了這樣的時機，開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蘇聯的改革開放是政治和經濟同時啓動，而且速度頗快，也部分導致了後來蘇聯的瓦解。中國大陸方面，則是先有經濟的改革開放，可是在政治上並沒有太大的改革。

⁸ 關於蒙古與中共從建交、交好、交惡至有可能因為蘇聯與中共關係改善而得到新機會的歷史，參見藍美華（2000）。

蘇聯解體之初，經濟狀況非常不好，所以也沒有辦法幫忙蒙古，後者只能自求多福，在困難的經濟條件中，辛苦地逐步走上經濟改革與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烏蘭巴托和北京的關係，則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前進，越來越好，越來越密切。現在，蒙古的第一大出口國是中國，佔比九成以上，第一大進口國也是中國，佔比三成以上，雙方的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

1980年代下半葉，蘇聯在戈巴契夫領導下的政治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影響了東歐，也影響了蒙古；蘇聯放棄對東歐的控制，1987年也開始從蒙古撤軍。在這樣的機緣下，蒙古開始步向民主改革，1989年12月，烏蘭巴托出現了半個多世紀來第一次非官方組織的群眾示威遊行，呼籲民主改革，全國各地爆發群眾示威。同月，蒙古成立第一個反對黨。1990年5月，蒙古修訂憲法，刪除一黨專政條文，正式開放黨禁。1992年，俄國軍隊完全撤出蒙古。同年2月12日蒙古歷史上第四部憲法正式生效。根據該憲法，蒙古的國名改為「蒙古國」，實行設有總統的議會民主制；蒙古國是獨立主權的共和國，崇高目標是在國內建立人道主義的公民民主社會（藍美華，2017：44-45）。

蒙古民主化之後，政治方面進步非常快，比起同時開啓民主化的中亞各國要好得多。除了總統、國會和各級政府與議會的直接選舉外，至今已有數度政黨輪替。在民主化初期，蒙古經濟非常弱，慢慢才進入穩定狀況。蒙古民主化之後，在外交方面最重要的一個政策就是「第三鄰國」政策，因為他們期待在中國跟俄國之外，把其他可能的國家和國際組織當成第三鄰國，開創自身更廣闊的國際空間，有個嶄新的出發。

蘇聯瓦解、蒙古民主化之後，兩國關係剛開始非常不好，甚至蒙古有反俄的傾向，很多人認為蒙古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種種錯誤都是因為俄國影響而導致的。可是，在2000年11月普丁訪問蒙古之後，兩國關係有所改善，蒙古看俄國的角度與評論均比較客觀。蒙古人認為，雖然在社會主義時期蒙古受到俄國的控制，但也從俄國那邊學習到西方許多現代的思潮與技術⁹。

⁹ 關於俄國在蒙古現代化中扮演的角色，參見藍美華（2006：91-110）。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蒙古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甚至太密切了，還引起了一些反彈，導致有些蒙古人有反華的傾向，甚至有人反諷說，蒙古是不是要恢復為中國的一部分¹⁰。但是，蒙古好不容易才獨立，不可能願意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對於中國在內蒙古的各種措施非常關心，假如有政策造成對內蒙人的傷害，也會上街示威抗議¹¹。儘管如此，但是蒙古與中國大陸的具體關係是更加密切的；蒙古人到內蒙古非常方便，很多人會去內蒙古買東西、看病；大陸政府也給蒙古各項優惠的獎學金，有很多蒙古留學生在中國讀書。

在蒙古的市場上可以看到很多中國的貨品，但是也有很多東歐、日本、韓國的產品。東歐和蒙古以前在社會主義集團有互動關係，俄國的東西當然更是長期存在蒙古市場。蒙古和日本的關係一向良好，而和韓國（南韓）的關係，則是在蒙古民主化之後才建立的，但雙方關係在很短期間就變得非常密切。日本的東西比較貴，所以一般蒙古人買得起的韓國產品是比日本產品要來得多。

不論是 1911 年的獨立運動，或者是 1921 年到 1990 年，蒙古的獨立都不是真正的獨立。1911 年的獨立運動沒幾年就失敗了，而且中俄兩國以及其他國家都未加以承認。1921 年的獨立運動成功之後，一直到二戰結束、蒙古公投證明獨立意願後才獲得中華民國承認；中共建政後，蒙古仍是受到中蘇關係重大影響，而且在中蘇交惡之後，他們也不得不選擇靠向俄國，然後各方面受到蘇聯很大的影響，甚至很多人認為蒙古就是一個蘇聯的附庸。但是，在 1990 年代民主化之後，蒙古真的獨立了，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¹⁰ 筆者曾多次接獲詢問有關蒙古國會議員提議要回歸中國的事情，經筆者詢問蒙古友人，知道這其實是個反諷說法，並非真想回歸。根據筆者的經驗與研究，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¹¹ 舉例來說，2020 年 8、9 月發生內蒙古要求當地少數民族學校以漢語而非蒙古語教授統編課程而引發爭議一事，蒙古人也在烏蘭巴托示威，支持內蒙的蒙古族人的抗議。中國大陸外長王毅 9 月 15 日前往蒙古訪問時，有上百位示威者在蘇赫巴托廣場抗議；甚至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s. Elbegdorj）9 月 24 日也致信習近平，抗議中共當局此一政策，但信件次日遭中共駐蒙古大使柴文睿退回。新聞上對此事件有很多相關報導。關於額勒貝格道爾吉的抗議信以及柴文睿退回該信時所寫的信件，參見張北（2020）。

的事務，不需聽從俄國或是中國，還聰明地提出「第三鄰國」政策，在國際上扮演積極角色，蒙古成爲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

肆、結論

蒙古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件重要的大事。第一件是1911年的泛蒙古獨立運動，第二件是1921年的獨立建國運動，然後第三件是199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民主化對於蒙古是非常重要的，讓它成爲今天真正獨立的蒙古。

兩次獨立運動和一次民主化運動讓蒙古學習很多。1911年獨立運動的失敗，讓蒙古了解其實獨立不是這麼容易的，必須俄國、中國以及國際情勢都有正面的條件配合才行。因此，我們可以說，1911年獨立運動的失敗幫助了蒙古1921年獨立運動的成功。務實地說，所有蒙古人共同建立一個大蒙古國是很艱難的，而且他們也沒有像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如此傑出、重要的領導人。在1921年獨立運動時，蒙古人就沒有期待建立一個大蒙古國，而是非常務實地，先追求外蒙古的獨立。第二次獨立運動在一開始即獲得了蘇聯支持，在二戰結束之後，也獲得中華民國的支持，1949年之後更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國際條件可以，蒙古獨立建國就容易成功。而且蘇聯幫助蒙古進入聯合國，讓它有了國際認證的地位。

從1921年的蒙古獨立到開啓民主化運動之前，也是因爲大環境的關係，蒙古沒有辦法獲得真正的獨立，而必須在中俄之間做選擇，最後也因爲務實的考量，選擇了蘇聯。由於大環境的改變，蘇聯實力弱了，接著蘇聯跟中共都在改革，蒙古也搭上了改革的好時機，開始民主化的進程。二十世紀蒙古獨立建國的三件大事分別是在清帝國衰敗、俄國帝制與蘇維埃政權交替以及蘇聯瓦解等大環境變動下發起的，雖然未盡成功，但蒙古能夠積極把握時機是明顯易見的。

從以上資料跟討論看來，一個民族想要獨立建國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最重要的是大環境，亦即大環境是不是允許一個民族去獨立建國；「民族國家」、「民族自決」的概念普遍被認爲是正義的，但如果大環境不許可，也僅是空話。另外，第二個就是自身的條件，自己擁有獨立建國的決心與

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十三世紀，蒙古有成吉思汗這樣的領導人和英雄，有能力帶領群眾建立大蒙古國。可是在二十世紀，雖然有一些人試圖想要建立大蒙古國，可是並沒有像成吉思汗這樣的傑出人物出現。清代對蒙政策刻意利用盟旗制度讓蒙古各旗擁有固定放牧領域，一方面避免衝突，一方面也讓全面性的領導人不可能出現。沒有能力與威望足以服眾的領袖，加上大環境也不允許，所以蒙古人沒有辦法建立大蒙古國。

想要獨立建國，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有這樣的想法，但是蒙古想要獨立建國的想法是怎麼來的？1911年的獨立運動主要是因為清帝國能力下降，終至崩潰；自認是歸順滿人、而非漢人的蒙古認為既然滿人所建立的帝國已經瓦解，蒙古自然要回歸原來獨立的狀況，所以發起了獨立運動。1921年的獨立運動可以視為是1911獨立運動的持續。蒙古在1911年宣布的獨立在1915年遭到取消，由獨立變為自治，甚至在1919年連自治都被徐樹錚領軍逼迫撤銷，但蒙古並未放棄獨立的想法。此時中國軍閥割據，而俄國已經改朝換代，蘇維埃新政府建立；退敗的俄國白軍在1921年2月卻佔領蒙古，想將其作為反攻基地；蘇俄與共產國際則支持蒙古獨立，想把蒙古作為亞洲革命的樣版；這種狀況下，紅軍當然會採取行動，協助蒙古獨立的行動。此外，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的說法響遍整個世界，蒙古當然也明白這是一個好的機會，所以重新啟動獨立運動。

蒙古的兩次獨立運動都是由王公喇嘛領導的，加上內蒙古和布里雅特的王公與知識份子的協助。當時蒙古的知識份子就是王公喇嘛，他們的發展應該是受到內蒙和布里雅特知識份子思潮的影響，因為後面這兩個地區畢竟是較早接受中國跟俄國的文化影響。獨立建國的能力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是非常務實的政治軍事。從文化思想方面來講，共同的蒙古語文讓蒙古和內蒙、布里雅特可以互相溝通，並且把新的知識與想法引進來。他們彼此的互動跟交流相當多，影響也大，所以蒙古的確是有個全體蒙古人的認同，才会有建立大蒙古國的想法。至於政治與軍事方面，蒙古的籌碼是較少的，還是要依賴俄國的支援。

蒙古、內蒙古與布里雅特各有自認優越之處。內蒙古和布里雅特分別受中俄影響，接觸中俄文化，覺得自身在現代的知識文化方面領先蒙古；

但蒙古認為內蒙和布里雅特被漢化與俄化，所以文化已經不純。總之，蒙古比布里雅特和內蒙古在全體蒙古人之間是地位較好的，因為布里雅特和內蒙古都沒有得到獨立，而蒙古獨立了，但是它的獨立卻是借助著內蒙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協助而完成的。

但是蒙古獨立的維持必須加上民主化，才能夠走向真正的獨立，而不只是表面獨立、實際上卻是受其他國家的控制。在此要特別指出一點，即便在社會主義時期，蒙古受到俄國很大的控制，但是蒙古的領導人和知識份子也是想尋求真正的獨立，只是大環境條件不足，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獨立。因此，想要得到真正的獨立，除了自身必須要有足夠的決心、能力與共識外，還要能夠抓住大環境所給予的機會，積極運作執行才成。從蒙古獨立建國的個案來看，內部與外部的條件均需配合，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 「中俄聲明文件（附另件四款）」，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03-32，168，173 (1)，民國 2 年 11 月 5 日。
- 「收外交部公函函送蒙文協約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045-308，民國 4 年 10 月 6 日。
- 《國民政府公報》，1946 年 1 月 7 日。
- 唐在禮、唐在章，1912。《蒙古風雲錄》。南昌：油印本。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伊德新諾爾布、布瑪（編），2003。《蒼茫草原的國度：二十世紀的蒙古》。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張北，2020。〈蒙古前總統抗議強推漢語教學 致信習遭退回〉《大紀元時報》9 月 27 日（<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0-09-27/84124516>）（2020/11/1）
- 畢桂芳，1968。《外蒙交涉始末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 陳崇祖，1926a。《外蒙古近世史》（第一篇）。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崇祖，1926b。《外蒙古近世史》（第二篇）。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籙，1971（1917）。《止室筆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 楊詩馨，2006。《恩琴在外蒙古活動之研究（1920-1921）》碩士論文。淡水：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 蒙藏委員會（編），1962。《邊疆涉外關係》。台北：蒙藏委員會。
- 蔣中正，1945。〈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大公報》8 月 25 日；亦收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1，演講（http://www.ccf.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6:0025-11&catid=154&Itemid=256）（2020/11/1）
- 蔣廷黻，1952。〈三年控蘇的奮鬥〉、〈我國控蘇案全文〉，《我們的敵國》（下集）。台北：中央日報社。
- 藍美華，2000。《澤登巴爾時期外蒙與中共的關係（1952-1984）》。台北：蒙藏委員會。
- 藍美華，2006。〈蒙古國際主義中的俄國因素〉《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25 期，頁 91-110。
- 藍美華，2017。〈從與鄰關係看現代蒙古的生存之道〉《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3 卷 3 期，頁 37-57。
- Dindub, L. 1977. *Mongyol-un tobči teüke* (A Brief History of Mongolia). Bloomington: Mongolia Society.

- БНМАУ-ын ШУА-ийн Түүхийн Хүлээлээ & НАХЯ-ны Дэргэдэх Улсын Архивын Хэрэг Эрхлэх Газар. 1982. *Монголын ард түмний 1911 оны үндэсний эрх чөлөө,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лын төлөө тэмцэл, баримт бичгийн эмхтгэл (1900-1914) (Mongolian People's Struggle of 1911 for National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1900-1914)*.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Улсы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
- Курас, Л. В. 2017. *Панмонголизм как проявление этничности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мира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X века (Pan-Mongolism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thnicity of the Mongolian Worl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Иркутск: Отгиск.
- Ширэндэв, Б. & Ш. Нацагдорж, Ерөнхий редакцийн гишүүд, 1968. Бүгд Найрамдах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ын түүх (History of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Боть 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Улсын Хэвлэлийн Хэхэг Эрхлэх Хороо.

Three Major Events of Mongolia's Seeking Independ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ei-hua L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Mongolia has experienced thre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namely the Pan-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21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90s. These three major events were initiated under major environmental changes such as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Empire, the alternation of Russian monarchy and Soviet powe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t is obvious that Mongolia actively seized these opportunities. From the case of Mongolia,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a nation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s that the environment allows it, and that it has the determination, ability and consensus to do so.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the ability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country: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as well as pragmat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Besides, democratization is crucial for Mongolia to be truly independent.

Keywords: Mongolia, independent statehood, Pan-Mongolism, democratization

